污染企业成“衣食父母”背后的执法经济

堂吉伟德 职员

“县环保局目前有157人,其中行政编制11人,财政全供事业编制24人,剩下的133人均为自收自支人员。他们吃什么?只能吃‘排污费’。”河南一位县环保局长透露。(4月16日《潇湘晨报》)

为利执法是指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一些地方监管部门为了自己的办公经费和人员工资、福利问题,依靠收费罚款及其上级返还款项的创收执法或养鱼执法。执法创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公家的名义替公家收费;另一种便是借执法为名,替自己收钱。结果,执法部门没有成为法律的执行者,而是倒行逆施的破坏者和狼狈为奸的合作者,法律成了“任意把捏的面团”,执法伦理异化如此,公众的权利与安全又如何得到保障?污染企业成“衣食父母”的执法取利乱象背后,本质上讲还是权力失去监督导致其泛滥。

执法取利形式不同,实质却大同小异:或为违法者提供保护,或收钱就可以网开一面,或乱罚款乱收费,甚至可以“执法承包”。在执法为利的思维下,一些地方和部门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从当年安徽灵璧县“局长吃交警,交警吃百姓”的敛财食物链,到近年来屡禁不止的“执法为利”,“权力经济”和“执法经济”在一些地方和领域,已经变得极为严重。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罚款几乎成了一种经济模式,地方财政给执法部门下达创收任务,执法部门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到处罚款,这里面便有所谓的“利益返成”、“奖金挂钩”。前些年,山东某县质监局一位食品审查员曾多次向记者反映:“现在所有人员的工资福利从收费罚款中出。我们现在就变成了‘养鱼执法’,每天的工作目标就是想着如何完成‘创收’任务。”

于是,从食品监管中的“执法为利”,到交警管理的“放水养鱼”,到治理超载的“合法漂白”,再到环境保护中的“衣食父母”,虚假的矫情之下,是根深蒂固的执法经济在主导。于是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超载超速乱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甚至越治越乱。究其原因,在于“执法为民”向“执法为利”发生了变异,权力成为自我营私的利器。若没有对权力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执法取利的症结得不到遏制,那么各种乱象就难以改变,也是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极大颠覆。

著名学者孙立平先生说过,权力失控是导致社会溃败的根源。在时下的财政体系下,很显然并不存在所谓的“生存需要”,而是权力异化的深度表现,也是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深刻检视,其背后是权力失去监督和约束导致的权力滥用。破解执法为利,当以重构根本机制为核心,让滥用权者付出代价,让行为人受到问责,让他们真正对“权力运用”有所敬畏,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以此让权力伦理回归,从根本上杜绝执法自肥、执法营利的制度土壤。如此,“权为民所用”才不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漫画/吴之如

政府对企业可以扶持不能“溺爱”

范广阔 职员

“农夫山泉执行的产品标准还不如自来水标准”经媒体披露后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尽管农夫山泉和浙江省卫生厅、质监局都先后发表声明予以否认,但中国民族卫生协会14日再次发文,对农夫山泉始终不认错的强硬态度严厉批评,并再次确认,农夫山泉执行的产品标准不如自来水标准,同时该协会还指出地方政府涉嫌袒护作假。(4月15日《京华时报》)

作为著名品牌的农夫山泉,竟然被媒体曝出其执行的产品标准还不如自来水标准,一时之间舆论哗然。虽然目前牵涉其中的各方都各有说辞,但是作为消费者,自然更愿意相信作为“第三方”的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而不愿意相信和农夫山泉有着地域归属和地域利益关系的浙江省卫生厅与浙江省质监局。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按照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有关负责人的说法,由农夫山泉作为唯一企业代表参与制定的浙江省地方标准中,有些产品指标的规定明显是为农夫山泉特设的。

这也就意味着,本来作为运动员的农夫山泉,在产品的质量标准制定过程中,同时又充当了裁判员的角色,并且制定出了一个对自身有利的地方行业标准,甚至某些产品指标,涉嫌为自己特设。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么做虽然有为了自身利益而罔顾消费者利益和社会责任之嫌,但企业毕竟有逐利本性,在有机会为本企业谋取利益的前提下,不太可能无动于衷。这其中更应该被质疑的,其实是对企业有“溺爱”和袒护之嫌的地方政府部门。

虽然农夫山泉作为企业代表参与了产品地方标准的制定,但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不只考虑地方利益,还顾及消费者的权益;不考虑企业作为地方纳税大户的身份,而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靠科学数据说话,那么就不应该为农夫山泉特设指标,降低标准,自然也就没有了今天的“东窗事发”。

地方政府对辖区内所属企业的“溺爱”和袒护,表面上看是为了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着想,从长远来看,实际上是在伤害企业。因为越是著名的企业和品牌,最终越要经受市场的考验;企业越想做大做强,越要能够经受住市场的考验,地方政府过度的“溺爱”与袒护,就像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把企业置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地方政府要想扶持地方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土地政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来实现,但就是不能以放松对企业产品的质量把控和降低产品标准为代价。因为当企业的产品走向市场,接受市场的检验和消费者的选择,地方政府就已经是鞭长莫及,无法再起到为企业保驾护航,遮阴挡阳的作用。因此,放松要求,降低标准,只会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变得先天不足,而不会帮助企业茁壮成长,做大做强。

“国家福利”更考验财政效率

木须虫 公务员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撰文称,需警惕滑向过度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和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公平的“歧途”。同时,他认为,如果过多靠国家福利,而不是靠自己奋斗,民众幸福感亦会打折扣,不可持续。(4月16日央视网)

这番言论很容易被误读,“过多靠国家福利,民众幸福感会打折扣”,易于引发公众的反感:我们的国家福利在哪里?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安有所居等等,几乎每个普通百姓都有切身痛感。楼价一涨再涨,养老保险多轨制,虽然实现低端全覆盖,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比如新农保,只够买几斤肉,诸如此类。在国家福利相对贫乏的语境下,谈国家福利过多的负面作用,就好比跟吃不饱饭的人谈吃得好吃得多会撑坏一样,是一种刺激,宁愿撑死也不愿饿死,大抵心态相同。

当然,他探讨的是如何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命题,是直接分配,还是再分配?再通俗点讲,是直接给自己打工,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先“给国家打工”,再通过“国家福利”的形式,返还给民众。理论上讲,两种方式都能够实现殊途同归。但就实践路径来看,前者更倾向于发挥个体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发挥市场调节各层面利益的最大作用;而后者则倾向于“大包大揽”,由政府统筹发展与分配。应该说,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需要解决好分配不公的问题,后者则要防止对经济与市场干预过多、过死,同时还要考验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

应该说,如何更有效、更合理、更科学地分配发展成果,不仅需要理论创新,更需要实践检验。但是,“国家福利”作用不只是关乎分配话题,更关乎公共社会保障共同底线的成色。辩证来看,国家福利和个人奋斗不是“鱼”与“熊掌”,单纯靠国家或者个人,并不利于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不鼓励“国家福利”过高,也许有合理成分,但不等于倡导包容性增长,就不要“国家福利”。

事实上,鼓励个人奋斗和健全国家福利应该兼顾,虽然从外部来看,国家福利考验财政收入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但从内部来看,国家福利更体现财政支出的结构与效率。尤其是当下公共保障还不健全、作用力还不够强的语境下,把有限的财政收入更多地用于民生与社会保障,比单纯向收入要增长更重要。

人才留在企业更有利于国家

杨国栋 法律工作者

学国际金融贸易专业的董小姐曾进入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工作。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年后,另一份年薪20多万的工作向董小姐发出邀请,于是她在广州一呆就是6年多。考虑到女儿年纪大了,个人问题还迟迟没有解决,董爸爸坚持半个月说服了女儿回武汉参加公务员考试。(4月16日《楚天都市报》)

家人和朋友多在湖北,也许是董小姐最终下定决心回来考公务员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公务员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是她宁肯放弃20多万的年薪考公务员的关键因素。虽然普通公务员可能连十万元的年薪都未必能拿到,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相对轻松的工作、退休后与在职收入相差无几的退休金,无疑对年轻人有着巨大的诱惑。联想到此前哈尔滨三千大学生争考环卫工的新闻,一份稳定且有保障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对人们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但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去考公务员,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人才流失极有可能影响到相关行业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也不利。董小姐如果能留在企业,也许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但去当公务员,等于放弃自己的专业与特长,实在有点可惜。青年才俊应该留在企业和科研机构创造财富、搞科研创新,而不是把自己的才能浪费于文山会海中。为防过多人才涌向政府机关,造成人才浪费,看来是有必要给公务员考试降温了。

除了要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缩小企业员工与公务员的收入差距,更要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保障,通过加强劳动监察力度,落实好带薪休假等福利待遇。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要加快推行,不能再让公务员游离于社保体系之外,不交个人养老金却能享受高于企业职工数倍的退休工资。收入、福利上的差距缩小了,公务员热才不会长期高烧不退。

当然,公务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别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考”通过率百中无一,就是真当上了,机关里的激烈竞争也一点不比企业逊色。如果升职遥遥无期,那传说中的高薪高福利也许仍然与你无缘。

董小姐如果考上公务员,估计收入也会大幅度缩水,届时过惯了高消费生活的她能否适应?相比企业,机关里的人际关系格外复杂。习惯了指挥别人的高级白领变身普通公务员未必就能适应。到时再想回头,可就没这么容易了,毕竟放下的专业和业务、客户关系未必能再捡起来。要回老家发展,不必把目光都盯在公务员上,干老本行也许更有优势。

公务员固然是年轻人理想的职业选择,但不必都吊死在一颗树上,学一门足以糊口的专业技能,提高自己的求职竞争力,才能真正过上比公务员更有保障的生活。

淡化“门票经济”需全国一盘棋

李冰洁 医务工作者

近日,免费进入的湘西凤凰古城,开始收门票。江西婺源景区的通票价格则由原来的180元上调到了210元,涨幅达17%……全国多家景区正掀起一阵涨价潮。令人欣喜的是,15日,湖北省物价局发出通知,今年五一、十一期间,省内318家景区(景点、参观点)门票价格,将实行降价优惠,无论是从优惠力度、范围和时间来看,都是我省旅游市场最大的一次。(4月16日《楚天都市报》)

湖北在“一片涨声”中对景区实行“集体降价”,无异于向游客伸出了热情欢迎的手,招呼游客到湖北去旅游。这一招比景区打林林总总的广告效果要强十倍、百倍,也令算计着如何涨票价的景区汗颜。

在“众人皆涨,唯独我降”的氛围下,湖北景区普遍降价,景区票价呈现“你涨我降”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太奇葩了,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可以肯定,今年湖北必定会成为吸引游客的“洼地效应”,游客将成倍增长,之后再算总账,门票收入虽少了,但旅游总收入还会不降反增。

2002年,杭州西湖在全国率先尝试免费模式。对于杭州的“心意”,游客们用“脚”做出了反馈。2011年,杭州旅游总人数达到7487.2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1191亿元,是2002年的四倍(2012年10月3日中国新闻网)。相信,游客们对湖北的“心意”也会用“脚”做出反馈。

在旅游问题上“算大账”,是比较聪明的营销策略。不过,也要看到,一些地方“算小账”有不得已的苦衷。财力有限,景区维护管理费用紧张,情急之下把手伸向游客。这虽然是一种短视行为,但不得不出此下策。所以,景区降价往往凭地方政府的自愿,比较随意,也比较混乱,非常令人不爽。

事实上,自然景观和历史文物是全人类共有的财产和文化大餐,理应向全人类免费开放。今年,张家界决定向全世界19岁以下中小学生免票(4月16日《潇湘晨报》),为自然景区免费向全人类开放迈出了一小步。但是,在社会共识不断形成的当下,这种免费开放不应靠地方自愿。

同一片蓝天下,为什么有的地方可以降景区门票,有的地方反而上涨呢?主要是降门票没有全国一盘棋。尤其是“3年解禁期”被一些景区严重误读,“3年解禁”期成了“3年涨价”期。每次“3年解禁”期快到时,一些景区你方唱罢我登场,为涨价造势。

某种程度,景区不断涨价,除了政府差钱和景区短视以外,更重要的是,一者,没有全国性硬性规定:景区实行“阶梯降价”方案;二者,拜“3年解禁”期所赐,一些景区纷纷趁机涨价。如果全国一盘棋,只准降,不准涨,这种景区门票“你涨我降”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将不复存在。

“申遗”成生意是资本重新讲述的“文化”

钱兆成 媒体人

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正面临大规模拆迁。当地政府给出的拆迁原因,是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需要。(4月10日《云南信息报》)

兴教寺建寺一千多年以来,确实有兴兴衰衰的过程,但是一直香火不断,代有住僧、法事一脉相承。兴教寺也遭到过破坏,但是修缮不止,玄奘灵骨塔从没有开过。1961年,兴教寺就被国家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单位。然而,现在兴教寺为何面临被拆除的危险?答案很简单,只因是曲江模式惹的祸,在“文化+旅游+城市”的曲江模式面前,老旧的寺院所代表的文化怀旧显然与发展格格不入。

众所周知,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来说,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的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文化和历史固然使房产市场升温,但随着寺庙渡假经济的做实,兴教寺必将成为大众消费设施而非文化对象,寺院文化却恐怕会渐失其光晕。

开发寺庙是为旅游经济服务,然而,旅游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化相伴相生,旅游活动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当旅游者将外来文化携带并传播到目的地时,必将对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观念造成一定冲击,从而影响到它的生活形态。开发寺庙的本质却是商业风暴,风暴过后留下的只是一堆建筑垃圾,会破坏兴教寺文化的多样性、厚重感。要不了多久,玄奘骨塔见证的将不再是历史,而是当代城市化的一场重建与摧毁。由此,通向那看似乐观的前景的道路似乎仍是一片泥沼。

每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主题,都应以最恰当的方式进行开发与传播,任何在建的文化项目,都应具备深厚的精神文化价值,而不是沦落为盲目扩张基础之上的空无内涵的符号。联合申遗名单上虽然只有兴教寺塔。但是修学和生活是一体化,兴教寺拆除这么多的建筑,僧团失去食宿的基本保障,等于是破坏了僧团,破坏了正常的宗教活动。玄奘塔失去僧人和信众的守护,仅仅作为一个景点,必丧失其文化内涵。

被资本重新讲述的“文化”将会替代它之前可以被想象并真正引以为豪的样子,更为可怕的是,成为人们所能认识到的唯一表述。我们的后代只能在渡假村中看着立体电影缅怀历史文化,而忘记了它原来的模样,无疑这是一种悲哀和失职。